

# 數位化與數位知識的生產：「國立臺灣博物館 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的回顧與反省

李子寧\*

## 一、前言

成立於西元 1908 年的國立臺灣博物館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之一。自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到臺灣省政府時期的「臺灣省立博物館」，再至精省後改隸中央的「國立臺灣博物館」，本館一直是典藏臺灣本土人文與自然標本文物重要的機構。自 2004 年起，國立臺灣博物館以本館最具代表性的典藏：臺灣原住民文物為對象，提出「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加入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本計畫不只是國立臺灣博物館在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架構下首度提出之數位典藏計畫，同時也是本館臺灣原住民藏品迄今為止所進行最有系統與規模的數位化計畫。

自 2004 年起，「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以「分族分年」的方式，將國立臺灣博物館館藏之原住民文物有系統地進行影像數位化及詮釋資料 (metadata) 的建構，迄今已跨越了 9 個年度。9 年來本計畫所獲致的成果，最具體的莫過於龐大的實體數位資料，其中包括了超過 1.3T 的數位影像資料，與 4 千多筆詮釋資料 (本計畫各年度數位產出統計參見附錄一)。另一方面，回顧 9 年來數位計畫的執行，除了具體而大量的數位資料外，「製作」這些數位資料的經驗，以及應用這批資料於博物館，所引發的博物館知識生產上的各種改變，或許形式上較前者為無形，但實質上的影響可能更為深刻。

簡單來說，我的理解是，一種數位計畫可涉及兩個層次的操作，第一種

---

\*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組副研究員兼組長



層次是較為技術的層面，涉及的是如何將具體的藏品轉化為數位媒介。在本計畫裡，轉化的數位媒介有兩種形式，一是平面的數位影像，另一則是描述藏品各種屬性的詮釋資料。製作（轉化）數位影像及詮釋資料的過程需要妥慎的規劃、資源的運用、長時間的操作等，這常常就佔去計畫執行大部分的資源與時間。然而，在另一層次上，將藏品轉化為數位媒介涉及的不只是技術層次的操作，同時也是一種組織與架構知識的新方式。換句話說，在創造數位媒介的同時，我們也正以一種新的方式組織與架構傳統的「知識」，並進而改變了博物館知識生產的方式。

因此，以下謹就本計畫執行 9 年來的心得與感想，提出簡單的回顧。

## 二、藏品與詮釋資料

國立臺灣博物館目前擁有超過 6 千件的臺灣原住民文物典藏。其主要的來源有二：一是源自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典藏，二是民國時期臺灣省立博物館（民 88 年後改名為「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典藏。就性質而言，這批典藏可類歸為「民族學收藏」（ethnological collection）。換句話說，它們是民族學調查研究的產品（或副產品）。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批典藏，特別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的收藏，不但可視為是學術調查的「科學證物」，同時其收藏過程也反映出當時殖民過程與收藏者對異文化的態度與想像（參見李子寧 2010, 2011），在此意義上來說，它們也是一種歷史收藏。

不論民族學收藏或是歷史收藏，收藏品的意義都不僅存在於物件本身，而必須仰靠收藏的脈絡記錄與研究者的解讀與詮釋，這就構成了藏品的脈絡（context）資料；另一方面，當物件進入博物館以後，也必須透過另一套管理「收藏」的系統才能有效地「儲存」藏品中的文化記憶（意義）。這套管理收藏的系統，有時稱為博物館的檔案系統（archive system），不只包括藏品本身的相關記錄，同時也包括一套分類、組織、架構藏品記錄的標準與規則。就像圖書館內的書籍、檔案館內的檔案文書一樣，每件圖書、檔案與藏品，都要在檔案系統裡「掛號」，取得其分類編號後，才能有效地被管理與運用。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掛號」不只讓物件取得系統承認的「身分」，也同時決定它在系統內的「相對地位」——也就是它在系統內的階層位置。最後，所有這些圍繞著藏品而衍生的記錄與資料，都和藏品本身一樣需要有系統的維護、保存與更新，同時，在數位計畫的執行過程中，妥善的轉化為數位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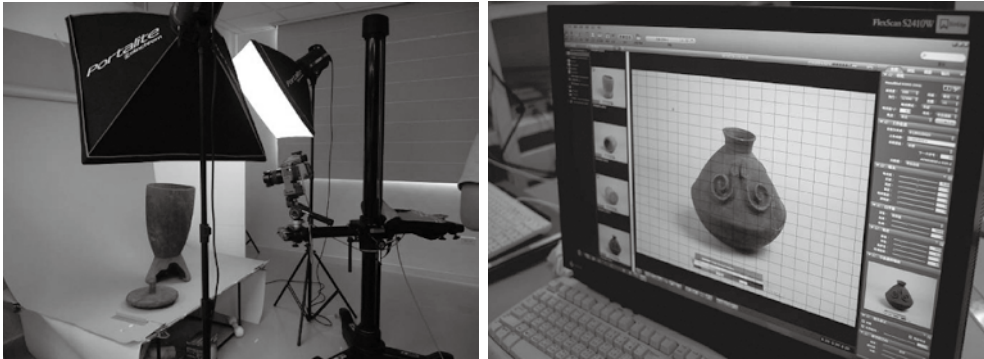




目標雖然沒有改變多少，然而「數位化」也不純然只是將傳統的記錄媒材（如照片、正片、文字標本卡、錄音帶、錄影帶等）轉化為數位形式，至少沒有表面想像的那麼單純，那麼機械化。首先，「數位化」本身涉及的就不只是單純舊資料的「形式轉換」，在數位化的過程中也會「製造」出許多需要被記錄的「新」資料，例如進行數位化採用的各種方式、所產生數位檔案的規格等資料。就此意義而言，我們不妨可以將博物館藏品數位化後的「詮釋資料」（metadata）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實體物件」（藏品）本身的描述，另一類則是對（數位化後）「數位物件」的描述。前者為博物館傳統上描述藏品物件（屬性）的資料，後者則是在數位化過程中所衍生的資料。

其次，即使是將傳統形式的資料「數位化」也不代表原有的資料就是原封不動地被「轉換」到新的媒材之上。Crary（1999）就曾提醒過：媒材不只是被動的記錄儲存資料，媒材本身具有的屬性，或者其「物性」（materiality）一樣會影響（被記錄的）內容。傳統上，博物館的檔案系統都是以書寫文字作為記錄的方式，數位化則根本扭轉了這種依賴書寫文字的記錄方式，自此以後，藏品記錄不再以可辨識的人類文字符號，而是以只有透過適當「軟體」才能解讀的「數值」（numerical）方式被記錄與儲存。這個過程，講來複雜，換在百年前更不免會被世人斥為是「天方夜譚」，在今日卻有如家常便飯，即使我現在埋首案前在寫這篇文章之同時，我身旁的電腦機體內就在默默忠心地為我打出的每個字進行「數位化」，我們早已處於一個「後數位革命」的時代中，但常忽略了數位媒材對我們感官與認知模式的轉化力量（transformative power）。

在博物館中，從傳統資料轉換為數位資料後的改變也是顯而易見。過去一整個房間數十座龐然檔案櫃的資料容量，如今只要儲存在一顆手掌般大小的硬碟就可隨身攜走；過去以人工幾乎無法或難以察覺的資料關係，今日透過檢索與交互參照（cross-reference）彈指之間便可獲知。以上的改變——以驚人容量容納龐大的資料，並以驚人的效率進行資料的檢索與交互參照——還只是最表面而顯見的。實際上，從服務觀眾的自動導覽系統、資訊亭（information kiosk），到展示運用的互動裝置、虛擬實境，再到數位典藏、典藏資訊管理系統（collection management system），甚至虛擬博物館（virtual museum），數位科技為這個過去象徵「傳統」的機構——博物館注入一股新的活力，不只根本改變了博物館內的運作模式，更徹底扭轉了博物館與觀眾間



本計畫拍攝數位影像

的關係。倡議者因此把數位科技看成博物館振興起衰的新契機：為觀眾提供更可及且更立即的知識，讓展示更多樣化與情境化、生動化，並提升博物館與觀眾間的互動性 (Henning, 2006: 302)。

當然，所有以上的轉變及可能性都始自一個最基本的過程——資料的數位化，也就是9年來我們在「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中所做的事情。表面上看來，它是一個繁瑣、耗工、單調冗長而缺乏創意的過程，好像是將過去囤積的 VHS 錄影帶轉為 DVD 般工程浩大，以及放棄卡式錄音帶與 LP 唱片重新改買 CD 一樣浪費資源。但是在另一方面，當我們在進行資料轉換的同時，我們同時也在產生新的資料，賦予新的詮釋，並以一種新的方式組織與架構傳統的「知識」，並進而改變了博物館知識生產的方式。

### 三、博物館知識生產與壟斷性

許多作者 (如 Henning, 2006) 都指出，數位典藏對博物館的知識生產一項重大的影響，就是打破傳統博物館對藏品知識與呈現方式的壟斷性與權威性。更有人斷言，這個趨勢對於社會中原本就屈居弱勢的團體或族群，例如臺灣原住民，是一種正面性的轉變。的確，原本必須經由博物館的典藏研究人員，或是特定的展覽時機才得以有機會接觸的博物館藏品，如今可透過數位典藏的網站，如臺博館在本計畫下所架構的「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數位典藏網」(<http://www.ntm.gov.tw/aborigine/#/page0/>)，而直接面對面接觸。同時，網站上的檢索介面，更讓使用者得依自己的喜好，對藏品原始資料做自



本計畫成果網站：「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數位典藏網」

由瀏覽或選擇組合，不必再透過博物館中介的詮釋。數位典藏因此成為博物館知識「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重要推手。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數位典藏固然對博物館知識生產的方式造成重大的改變，但這種改變未必代表著博物館對知識的壟斷與權威就此被瓦解。換句話說，資料的開放並不等於知識權的解放。事實上，在跨入資訊時代的現代社會中，資料的問題從來就不是「患寡」而是「患眾」。試看網際網路上的經驗就可以知道，真正造成人們困擾的並不是找不到資料，而是資料過分龐大而無法適從。同樣地，數位典藏開放了博物館的典藏資料，但龐大卻無組織的資料造成的困擾事實上比沒有資料還要嚴重。不論在傳統時代或是在數位資訊的時代，如何將龐大的資料予以分類組織成為可管理、可運用的「知識」一直都是博物館技術的焦點。而在數位時代裡，和傳統時代並無二致，將數位資料分類組織成為可運用知識的主導權仍掌握在博物館手中，並未實質的開放。從前述臺博館數位典藏的例子中可知，數位化過程中有相當多的資源是投注於「詮釋資料」的格式擬定與建構上，但細觀臺博館及其他國內典藏機構的「詮釋資料」，可以發現主要欄位的設計若不是基於內部管理的需要，就是基於(人類學)研究上的考量，再不然就是為了符合數位媒材本身屬性上的規範。其壟斷性與權威性與傳統博物館慣行的登錄分類技術並無本質上的差異，真正關鍵性的差異只是在使用媒材上的區別。

提到使用媒材，本文前段一直強調媒材的屬性(或物性)會影響知識的內容。人類學上更經常談到的是，文字的使用對一個民族知識的傳承、累積與知識的性質有深遠的影響(如 Goody 1977)。而在人類古代文明的歷史中，更不乏統治階級透過對文字使用的獨占以達鞏固統治權力目的的前例。當博

物館使用的媒材從書寫文字轉為數位媒材後，不也同樣會造成類似的情形？特別是以掌握媒材與權力關係的角度來看，我們不難看出，數位媒材，比起文字，是一種更需要專業訓練才能掌握的技術。另一方面，數位技術的專業分化程度亦比文字來得更細緻。上述兩個特性結合的結果，使得數位技術成爲一種需要更多資本投入的「昂貴」媒材。人類歷史上許多經驗告訴我們，當一種關鍵性的技術，需要越多專業知識資本的投入，就越會造成壟斷，使得「富者益富、窮者益窮」，而不是相反過來。以博物館的情形來說，當數位技術仍維持其相對專業密集而昂貴的性質時，博物館與社會弱勢族群間，甚至博物館與博物館間的不平等落差，只會越來越嚴重，而非越來越舒緩。說的更明白一點，就是數位典藏會加劇現有資本雄厚大型博物館與其他中小型博物館間的差距，更未必能扭轉過去博物館對知識的壟斷性。

#### 四、原住民文物數位典藏的反思

總結幾年來臺博館推動臺灣原住民文物數位典藏的經驗與歷程，我個人的一個反省是，我們過去也許太偏重且專注於「如何」進行數位典藏，而忽略了去思考「爲何」進行數位典藏，以及數位典藏後帶來的影響。事實上，這不只是臺博館數位典藏的缺憾，同時可能也是臺灣近幾年大力推動數位典藏的盲點之一。

在本文中，我將數位化視爲是一種「組織、架構與呈現知識的新方式」，同時特別強調「數位媒材」的屬性或物性對博物館知識生產所造成的影響。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角度，不僅是基於理論上的關懷，同時也有其現實上的目的。我參與臺博館的數位典藏已有相當的時日，雖說不上是全程參與，至少近十年來臺博館相關的數位計畫，從藏品實體影像數位化，典藏管理系統規劃，後設資料建構，到網頁的規劃，幾乎都曾參與其中；特別是自 2004 年後，年年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依分年分族的方式將館藏臺灣原住民文物予以數位化。不可否認，得以參與國科會這項堪稱臺灣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數位計畫不能說是一項不重要的經驗，我也很感謝國科會能夠年年補助本館進行館藏品的數位化。同時，將館藏品數位化本身當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更是一件「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的事。然而，另一方面，數位計畫執行過程卻是一件很「制式」的事，特別是到了近年，相關技術與規範都已相當成熟，何時該進行拍攝、何時該建置



後設資料，何時該撰寫報告、核銷結案，都有了固定的程序。就好像時節有序的農夫一樣，依時節做該做的事，然後，到了年底就等著將一包包的稻米穀收穫入庫了。

每當一年年度屆終，我看著這一年來辛苦的「收穫」：數以百計 GB 的數位檔案，心中自不免有著農夫式的滿足。但是，數位檔案畢竟不同於田裡收穫的稻米，後者在收穫後終究會成為人們的「盤中飧」而被消化掉，前者卻註定要永遠留在哪裡，年復一年，不僅帶來儲存上的壓力，同時也造成「消化」上的問題。比起博物館的實體物件（藏品），數位物件也許擁有較高的儲存效率，但是和實體物件一樣，累積過多一樣會造成「消化不良」。當一個博物館對實體物件「消化不良」，我們稱之為「典藏的危機」（李子寧，2005），當一個博物館對數位物件「消化不良」，我們該稱之為何？「資料的危機」？還是「知識的危機」？

附錄一：「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歷年數位產出統計

執行年度 (民國)	計畫名稱	族別	產出情形				
			數位化 件數	數位影像 總筆數	數位影像 總大小 (TIF)	metadata 筆數	其他產出成果
93	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一)	平埔族、 賽夏族、 邵族	254	934	69GB	254	紙本圖錄二套
94	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二)	魯凱族、 卑南族	288	956	18GB	288	紙本圖錄二套
95	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三)	鄒族、 布農族、 達悟族	537	1893	97 GB	537	紙本圖錄二套、 正片 3,786 張 (共兩套各 1,893 張)
96	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四)	泰雅族	634	1524	143GB	634	紙本圖錄二套
97	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阿美族	阿美族	700	3558	50GB	700	紙本圖錄二套
98	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排灣族	排灣族	750	4733	465GB	750	紙本圖錄二套
99	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排灣族(二)	排灣族	705	4347	474GB	705	紙本圖錄二套
100	國立臺灣博物館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八)	各族補遺	620	執行中	執行中	620	紙本圖錄二套

本質上來說，我覺得博物館在處理實體物件與數位物件都要面臨同樣的問題：如何讓這些東西產生意義（make sense）。特別是在民族學／人類學博物館中，其所謂的「民族學藏品」一直面臨著「去脈絡化」的質疑，因而也持續面對著「再脈絡化」的壓力。許多人似乎認為透過數位典藏——把實體物件轉為數位物件，民族學藏品這個知識論上的兩難就可迎刃而解。我對此深抱懷疑。數位物件在物性上固然有不同於實體物件之處，但是它終究無法改變實體物件作為民族學收藏品的本質，甚至能否忠實地再現物件已失去的「脈絡」也仍是一個未知數。

另外，數位物件也不是沒有其優勢之處。它的互動性，結合網路的分享性確實可減緩博物館對知識的壟斷性與權威性，但是，就如我在前段所說的，這個趨勢不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利用數位技術呈現知識至今仍是一種相當昂貴的資本投資時，各博物館間，博物館與原住民社區間原有的數位落差非但難以拉近，且恐怕有持續深化的可能，這是數位典藏一點值得我們深思之處。

## 引用書目

李子寧

- 2005 〈從清查到修復：國立臺灣博物館人類學組典藏的新定位與再思考〉。在《九十四年度博物館典藏品保存維護規劃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歐陽盛芝、李子寧主編，頁 1-22。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2010 〈博物館蒐藏與政治象徵——國立臺灣博物館蒐藏的政治學〉。在《博物館蒐藏的文化與科學》，王嵩山主編，頁 69-86。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 2011 〈展示臺灣史：從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到臺灣省立博物館（1920～1960）〉。在《博物館展示的景觀》，王嵩山主編，頁 181-210。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Crary, J.

- 1999 *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oody, Jack

-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nning, Michelle

- 2006 New Media. In Sharon Macdonald (ed.),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pp. 302-18. Oxford, UK: Blackwell

Manovich, L.

- 2001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